

热历史

司马光的《家范》影响深远

辽宁省图书馆馆藏的司马光《家范》是明万历年间由忠恕堂刻的汇编丛书之一，共10卷。

司马光以“家范”命名该书，意思就是将其作为教家治家的典范、楷模。

在此书卷首，司马光引用《周易》《大学》《孝经》中的论述，首先点明写书的目的“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无之”“圣人正家以正天下”。

商越

作为一位历史学家，司马光基于对丰富史料典籍的熟悉掌握，创造了家训文体的新形式。他在书中分列“治家”“祖”“父”“母”“子”“女”“孙”“伯叔父”“侄”“兄”“弟”“姑姊妹”“夫”“妻”“舅甥”“舅姑”“妇”“妾”“乳母”等，共计10卷19篇，汇集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典型故事、儒家经典中的治家修身格言，系统分析阐述了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道德标准、治家原则和处世之道。《家范》主张治家必以礼为先，推崇谦恭治家，强调勤俭致富，倡导“克己守礼”的家庭和睦之道。

家长该怎样为子孙后代谋福利呢？在《家范·祖》篇，司马光指出，为人祖者，“广营生计以遗之”，又指出“然果能利之者鲜矣”，意思就是他们能留给后代的不过是土地、房舍、粮食、金帛这些物质财物，应该学习圣贤，高度重视对子孙家人的思想道德教育——“圣人遗子孙以德、以礼，贤人遗子孙以廉、以俭”，给子孙留下德、礼、廉、俭，“以义方训其子，以礼法齐其家”“当教之使成人”，告诫人

们遗德比遗财更能造福子孙。反之，“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；愚而多财，则益其过”。给子孙后代留下美德、俭廉家风，是助其长久立足的精神源泉。

在《家范·父》中，司马光指出为人父的教子方略：“自古知爱子不知教，使至于危辱乱亡者，可胜数哉！夫爱之，当教之使成人；爱之而使陷于危辱乱亡，乌在其能爱子也？”指出只爱不教的后果。针对有些家长溺爱迁就，称孩子小不懂事、长大以后再教不迟的观点，司马光比喻为“犹养恶木之萌芽，曰‘俟其合抱而伐之’”。

鉴于“慈母败子”的教训，司马光在《家范·母》中，尤其强调了母亲家教的重要性“为人母者，不患不慈，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”“爱而不教，使沦于不肖，陷于大恶，入于刑辟，归于乱亡。非他人败之也，母败之也。自古及今，若是者多矣，不可悉数。”在该篇中，司马光还精心摘录了24位深明大义、品德高尚、教子有方的慈母故事，供后人学习。

司马光的《家范》对后世影响很



▲司马光像

大，被宋以后历代推崇为家教范本。南宋宰相赵鼎就在自己的《家范》中这样要求子孙：“司马温公《家范》，可各录一本，时时一览，足以为法。”正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价这部书：“其节目备具，切于日用，简而不烦，实足为儒者治行之要。”

（《辽宁日报》）

名人轶事

吴昌硕的从戎岁月与为官经历

邵国威

吴昌硕，初名俊，又名俊卿，但以其字“昌硕”闻名于世，晚清民国时期的书画篆刻大师，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。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位艺术大师在年逾知天命之年，还有过金戈铁马的从戎岁月与清风傲骨的为官经历。

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时任湖南巡抚吴大澂向朝廷上书，自请率湘军御敌。吴大澂北上给吴昌硕写了一封信，邀其入幕，协办军中文书事宜。此时吴昌硕已经51岁，他不顾家人的极力劝阻，毅然应允，慷慨从戎。在军旅途中，他刻了“吴俊卿信印大利长寿”一印，直抒对胜利的渴望。可事与愿违，半年后，吴大澂因战败被革职。又因为继母病重，吴昌硕乞假南归，其投笔从戎的梦想

破灭。报国无门，吴昌硕又闻以丁汝昌为代表的将士们舍身捐躯，于是悲歌：“海军未复谁雪耻？愤失海权蹈海死。呜呼！吾国多烈士，精卫衔石沧海填……”

甲午战败固然痛苦，但这并未使其沉沦，他仍怀一颗济世之心。1899年11月，吴昌硕得到江苏候補道员丁葆元的保举，以五品顶戴候补县令，代理安东（今江苏涟水）县令之职。在赴任告示上，吴昌硕写道：“只须预备公馆，打扫洁净，不得张灯结彩，徒事虚浮，亦毋庸出郊迎迓，切切，特谕。”寥寥数语，足以彰显其低调简朴的工作作风。

吴昌硕在任期间，事必躬亲，尽心尽责。安东地区土地贫瘠，居民饱受咸水之苦。为解决百姓饮水之难，吴昌硕在县衙前凿深井一口，后被百

姓命名为“昌硕井”，此井留存至今。

晚清官场诡谲腐败，生性淳朴的吴昌硕，不会曲意逢迎，这令他倍觉无奈，仅上任一个月，便自刻三方“一月安东令”印章后辞官归去。

吴昌硕将初来安东时写的一首诗刻在这三方“一月安东令”印中最大的一枚印体上，诗云：“旧黄河势抱安东，古木寒潭万影空。卧榻冷悬高士雪，卷茅狂叫大王风。诗来淮上秋山里，人在天涯水气中。眼底石头真可拜，倘容袍笏借南宫。”后署：“安东即目，己亥十一月二日老缶（吴昌硕别号），米元章曾为涟水军。”宋代书法家米芾在涟期间公私分明，清廉绝俗，曾离任涂墨以示清廉。吴昌硕在离涟之时以米公之志，寄为民之心，虽有许多无奈，但其清风傲骨，历历在目。（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）

史海钩沉

《洛神赋》的“再创作”

张丽娜

曹植的《洛神赋》自问世以来，无数人为其艺术魅力所折服，并对其进行了“再创作”。其中，最著名的当数东晋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。不过，唐人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记载，东晋首绘《洛神赋图》的名家并非顾恺之，而是晋明帝司马绍。

司马绍生于公元299年，是东晋第二位皇帝。他雄才大略，文武兼备，尤善书画。在27岁去世前，他创作了大量绘画作品，包括《史记列女图》《洛神赋图》《洛中贵戚图》《穆王宴瑶池图》等。

司马绍的老师名叫王廙(yì)，是王羲之的叔父，书画曾位居江左第一。张彦远称王廙“画为晋明帝师，书为右军法”。司马绍和王羲之都曾师从王廙，一个主攻绘画，一个主攻书法。

顾恺之生于公元348年，比司马绍晚出生近半个世纪。他被时人称为“三绝”，即画绝、才绝、痴绝。《历代名画记》中称，他的画作有“《七贤》《陈思王诗》并传于后代”。相传，传世的《洛神赋图》是顾恺之所作，人们今天见到的是宋代摹本。

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儿子，当过中书令，人称大令。他对曹植的《洛神赋》情有独钟，留下数本书法作品，其中小楷《洛神赋》在唐代时为柳公权所得，可惜首尾遗失，只剩下中段十三行，人称《十三行帖》或《洛神赋帖》。

宋高宗赵构是书法高手，晚年有《洛神赋》草书作品传世。到了元代，赵孟頫先学赵构，后师法王献之，创作了行书、行草、行楷、小楷等多种《洛神赋》书法作品。时人认为“大令好写《洛神赋》，人间合有数本，惜乎未见其全”，有了赵孟頫的《洛神赋》，则可以弥补这个遗憾了。（《洛阳晚报》）

古风

范蠡的经商不纯粹是为了利

陈或之

范蠡是春秋时期一个传奇人物。他是南阳人，在越国建功立业，这在人才流动频繁的春秋时期是很正常的。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兴国家，扩充实力，灭吴雪耻，使越国跻身春秋五霸。功名成就之后，他不贪恋权位，急流勇退。范蠡退隐之后的事情，许多人只知他与西施泛舟西湖的美谈，却不知他经商致富的故事。

范蠡离开越国后，先是到了齐国。齐国靠海，有海盐之利。范蠡看准了海盐能带来巨利，遂“耕于海畔，苦身勠力”，没过多久，就“致产数十万”。齐国人听说此事后，要举他为相，范蠡以为“久受尊名，不祥”，遂散尽家产，去到其他地方。

之后，范蠡落脚陶国，自称“陶朱公”。陶国虽小，但居天下之中，交通便捷，各国都来这里贸易。范蠡在这里再度致富，靠的是“与时逐而不责于人”，即密切关注市场动向，据此调整自己的策略，低价买入，高价卖出，而与人交易，最要紧的是“诚信”二字。范蠡在此“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，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”，难怪后世将范蠡看成是儒商之祖。他经商不纯粹是为了利，而要接济亲友、心怀苍生。（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）

文史小考

古代青铜的使用与祭祀、战争分不开

罗慕赫

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特征，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和战争分离不开的。鼎是一种饪食器，后来发展为礼器，一般分为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。青铜鼎上常有精美的纹饰，一些青铜鼎上还有铭文，记载制作此器的由来，表达希望子孙子孙永存此器的愿望。

在西周礼法制度下，不同社会阶层在着装、出行、器物使用上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别。具体到鼎的使用上，文献记载“天子九鼎，诸侯七鼎，大夫五，元士三也”，九鼎是

最高规格，没有比九鼎更高的礼遇了。

九鼎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，可以追溯到夏禹。那时，天下划为九州，传说夏禹用九州贡献的青铜铸成九鼎，将各地奇怪之物刻在鼎上，其用意是“使民知神奸”。百姓进入川泽山林采集生活物资时，因为已从九鼎上知道可能危害自己生命的奇怪之物的模样，很好地予以规避。细究禹铸九鼎的含义，一方面九鼎代表了夏朝对九州的控制，另一方面九鼎是国家与百姓沟通的方式，国家出于对百姓的爱护，善意提醒百姓哪里存在危险。（《光明日报》）

九鼎在夏商周三代间的传承，使其具有了证明权力正当性的功能。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中，我们只记住楚庄王的威风凛凛，却忘了王孙满的一番话揭示了九鼎深刻的内涵。楚庄王问九鼎的大小轻重，王孙满答道：“在德不在鼎。”以前夏桀昏庸，鼎迁于商，商纣暴虐，鼎迁于周，这便是“革故鼎新”，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创造新事物。王孙满认为“德之休明，虽小，重也；其奸回昏乱，虽大，轻也”。九鼎属于有德者，有德者能顺应天命，能以民为重，使上下协和，使邦国巩固。（《光明日报》）